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9)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武 曦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9)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青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5 字数 146,000

1989年 2月第 1 版 1989年 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30515-212-0/F·70 定价: 2.40 元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

主 任：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教授
副主任：丁日初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孔令仁 山东大学历史系 教授
丛翰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
张仲礼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研究员
陈诗启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主任
陈 绶 复旦大学历史系 教授
宓汝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茅家琦 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教授
洪葭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 研究员
徐元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徐雪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黄逸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编委会办公室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委会日常工作由丁日初副主任主持。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编辑部主任丁日初，副主任沈祖焯、程麟荪。

目 录

上海开埠前的对外贸易·····	张总氏(1)
旧中国的江海关·····	李荣昌(13)
清末上海若干行会的演变和商会的早期形态·····	徐鼎新(42)
1938~1941年国民政府的外汇管制·····	汪 戎(67)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贸易委员会·····	沈祖棻(94)

外论选译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外联合企业、技术转让与 技术组织·····	[美]柯伟林撰 程麟荪译(122)
----------------------------------	-------------------

学术动态

“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霜 木(143)
“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经济论文 观点综述·····	郑会欣(150)
整理编辑中的《上海总商会史料丛编》·····	杨立强(155)

书 评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导言·····	赵德馨(162)
《十九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介述·····	陈 潮(171)

《开平煤矿》简介..... 丁长清(179)

学者介绍

汤象龙..... 崔国华(186)

郝延平..... (195)

上海开埠前的对外贸易

张 忠 民

地处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地区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近代上海对外贸易的发生、发展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之后，但在此之前，特别是1685年清政府开放海禁之后，上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已经逐渐以其特有的方式成为当时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考察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不仅有助于认识当时社会经济的特点和发展轨迹，同时对于加深理解近代上海对外贸易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渊源亦不无裨益。

现存资料表明，早在唐宋年间上海地区古吴淞江畔的青龙镇已是江南一大外贸港口。元代时，海船商贩日本、交趾等国亦曾由上海出入。明洪武初，朱元璋一度在上海地区黄渡镇设立市舶司。明中后叶受沿海其他地区影响，上海海外贸易渐有发展。入清后，顺治年间清政府一度严行海禁，对外贸易自然无从谈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郑氏归清，清政府开放海禁并设江南海关于上海，上海地区的对外贸易较之前代发生了令人注目的变化。

一、对亚洲各国的输出贸易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江南海关设立之后，上海与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等地的贸易往来即为清政府所允许。当时竖立于上海县城东门外大关口的木榜上已正式列有“凡安南商船货税，

进口、出口俱以七折征收，东洋商船货税，进口以六折征收，出口不论货物，概收银一百二十两”^①的税则。乾隆中叶，清政府为沿海防务计，屡次下令夷船只准于广州一地收泊交易，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实际上这一禁令主要是针对以英商为主的西方商船，而同日本、菲律宾、暹罗、安南等亚洲各国进行贸易的商船仍频繁往来于上海等口岸。嘉庆《上海县志》说得很清楚，上海地方“闽粤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②。《上海朱氏族谱》也有记载说，“松江为濒海都会，领属七面上海为壮县，城临黄浦之上，去吴淞口不一舍，国家设关以榷商税，海舶估帆源源灌输，旁海诸国及奉天、吉林、闽粤百货殷鳞骈集，水陆辐辏”。这类贸易商船多为中国人所经营。其中前往日本的多称“南京船”。日人米泽秀夫所著《上海史话》称：日本有史料记载，元禄享保以来（十八世纪初）即不断有南京船从上海等口岸启航至长崎等地贸易。当时日本的《和汉三才图会》中已有上海港的地名记载。此外，国内也有史料说：“茸城（上海）去海不百里，寇盗出没，海禁甚严。邇来鲸浪已息，往来贸易概弛其禁。于是商贾及豪富之家竞装巨舰，东至日本，遇便风不数日可到彼土。”^③日本元禄元年（1688年）航日华船约七十艘，其中来自上海口岸的占十艘之多。三十年后日本推行正德新法，限制赴日华船数为每年三十艘，其中上海、宁波、福州三地就占了二十一艘。以后直至近代前夕，上海口岸同日本的贸易没有间断^④。

上海地区同暹罗的贸易主要由当地华侨豪富经营的“白头船”进行。这些船只大多载重三百吨左右，乾嘉年间约有八十多艘，其中二十四艘主要往来于盛产丝、茶、土布的江南宁波、乍浦

① 嘉庆《上海县志》卷5“关榷”。

② 董含《三冈识略》卷8，《日本刀》。

③ 参见魏能涛《明清时期中日长崎商船贸易》，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和上海口岸。^①

航行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商船也有一些。例如上海口岸同新加坡的直接贸易大约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1829年,前往新加坡贸易的八艘中国商船还都是出自厦门、广州。但至翌年,九艘中国帆船中已有两艘系直接出自上海口岸。所载两百吨货物中有上海出产的各色土布以及陶器、砖瓦、干果等等,价值三四万银元。十年之后,中国同新加坡的贸易商船每年增至一百五十艘之多,年商品输出额也从1830年的二十余万银元增至两百万银元。虽然我们现在还缺乏具体史料断定其中有多少是由上海输出的,但从当时出口商品的品种构成来看,上海口岸对新加坡的输出额似乎也应该呈增长趋势。^②

清前期上海口岸对亚洲各国的输出商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腹地以及上海邻近地区通过上海口岸转口输出的丝、绸缎、茶叶、纸、瓷器、陶器以及其他土产。另一类则是上海地区素负盛名的各式土布,它们是当时上海地区最大宗也最有影响的出口商品。其中不仅有本色坯布、紫花布,还有经过染踎加工的青蓝大布,等等。这些棉布除了上述由海船直接从上海口岸出洋外,也有一部分由福建商人在上海收购后贩至厦门等地再出口至东南亚。^③不过从总体上看,当时上海地区对亚洲各国的贸易往来主要由中国商船进行,而且如前所述这类商船总计大约也不会超过二三十艘,即使以每艘载重两百吨,每年往来一次计算,贸易商品的年输出量也不过六万吨左右,这样的贸易规模无
还是很有限的。

^①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1822, 姚贤轼《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59~62页。

^② 参见《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66~70页。

^③ 参见周凯《道光厦门志》。

二、经广州向西方国家输出上海土布

清前期的上海地区是国内手织土布的主要生产基地。所产土布质地精良、品种繁多、价格低廉。它们除了输出亚洲各国外，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近百年时间里还曾经向英、美等西方国家大量出口。上海地区出口至西方国家的土布主要是紫花布，又称南京布，是用带有天然土黄色的紫棉花纺织而成的上乘土布。这种布不加印染即有天然淡赭色，古朴高雅，明代时多为地方士绅所崇尚，清前期被西方商人认为是中国品质最优良的土布。^①

上海土布向西方国家的输出兴起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雍正年间。据史料所载，当时上海地区紫花布销售逐渐转盛，前来收购者多为闽粤客商，其中尤以粤商居多。收布时“务求细密，不计阔长”，^②用船载至广州售于行商，再由行商转售西方商人。17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在广州通过行商试探性地订购了一百匹南京布，约定九十天后交货。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真正成交，但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已由此了解到产自上海的南京布不仅质地精良而且价格亦低于广州土布。两年后东印度公司经过积极努力，总算正式订购到一万匹南京布，并首批运回英伦三岛八百九十六匹。翌年，公司又订购一万匹，运回九千三百七十四匹。在此之后的三四十年中，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大致上每年都要运回两万匹左右的南京布。^③

① 参见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 P188,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China, P.243~252, P.115~116.

② 钱淦：《江湾里志》卷4，“礼俗志·风俗”。

③ 参见H.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4~1834(以下简称“The Chronicles”), Vol. 1, P. 224、254, Vol. 2, P.61.

较英商购买较晚但却后来居上的是美国商人。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返航时载回的货物中已有八百六十四匹南京布。以后美国商船不断来华贸易，六年后输出的南京布已达十六万六千匹之多。之后不久的1798年更急剧上升到一百五十万匹，超过东印度公司和港脚散商的输出总额。据1801年的统计，当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南京布已足可使平均每四个美国人分摊到一匹。正如美国学者马士所说：“在整个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期，棉布不是从西方流向东方，而是从中国流向西方。南京布的形象即是为我们祖先提供衣着之用的小布。”^①

十九世纪初，上海地区所产南京布的出口进入全盛时期，并在1819年达到顶峰。该年仅由美国商船输出的数量已达两百九十三万匹之巨，加上英商所购即达三百三十五万九千匹。数量如此巨大的南京布不仅运往英美本土，而且还被转销欧洲大陆、南美以及马尼拉等地。

英美商人之外，当时来华贸易的其他西方国家，如荷兰、丹麦、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商船，其回程货物中几乎无一例外或多或少载有通过广州行商购买的南京布。这些西方商人评价南京布无论质地、价格都优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同类产品。因此，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经广州口岸转口输出的南京布始终是仅次于丝、茶的大宗出口商品。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有关记载统计，在1795年南京布出口首次超过百万匹以后，到1830年为止的三十五年中，竟有二十年的年输出额在一百万匹以上。总计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五十余年中，经广州口岸向西方国家输出的南京布总额高达五千万匹以上，平均每年将近一百万匹，其数量不可谓不大。

^①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P. 282.

上述经广州口岸输出的南京布有些也许并不真正来自上海地区，因为有史料说南京布原出南直隶而得名，但名声既起，他地所织之布每每亦称南京布。^①故当时广州西方商人向中国行商订货时，也有行商以其他土布混充南京布的情况。有经验的西方商人每每在订购合同中特别注明所购之货必须是色泽土黄、货真价实的江南紫花布。这就表明，那些由广州转口外销的南京布绝大部分来自江南上海地区应该没有多大疑问。这一点从当时广州西方商人订购南京布，交货周期一般都长达三个月甚至三百天，也可以得到佐证。^②

上海土布经广州口岸向西方国家的输出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终于发生了根本变化。缺乏近代先进生产技术为基础的海手工棉纺织品不仅完全丧失了西方市场，而西方国家的机制棉布却开始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市场。它们标志着一个新的贸易时代将由此开始。

三、洋货的输入

清前期上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不仅是棉布等国内商品的对外输出，同时也有相应的海外商品输入。它们既有上海口岸直接的对外贸易，也有来自闽广等地商人从广州等地的转口输入。康熙年间上海设立江海关后不久即有人说，“设海关于上海至今十五年矣。洋货及闽广货物俱在上海发客，小东门外竟为大码头”^③。这里所说的“洋货”正如清人屈大均所说，“出于西南诸番者曰洋货”，当为海外舶来品无疑。这些洋货品种繁多，既有奢侈消费品，也有普通日用品，既有来自东南亚各国，也有来自西方国家。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246~247页。

② 参见前揭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1, P. 224, Vol. 2, P. 3.

③ 姚廷遴《历年记》。

据嘉道年间江海关进口登记册所载，“来自新加坡、麻六甲、槟榔屿、爪哇、觉罗、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的船只，运来各种欧洲货品和从红海、波斯湾或印度洋及波里尼西亚群岛运来的鸦片、火石、胡椒、鱼翅、鹿角、洋红、皮张、钉子、豆蔻、靛水和干靛、海参、燕窝、珍珠母、贝壳、玳瑁、象牙、糖、甘蔗、槟榔、苏木、乌木、铁、铅、金线以及作船桅的圆木、装饰木及香水，还有染料和药材”^①等等。

闽广商人从广州转口贩运的洋货中，除东南亚各国的土特产商货外，还有来自西方国家的呢绒、羽纱、洋布、眼镜等洋百货。嘉庆时上海县城东门外已经出现了专做洋货生意的“洋行街”以及以此为业的“洋行”。迨至道光中叶，如当时上海一位地方官员所称：“悉上海号称小广东，洋货聚集，有洋商四家半。上海县外为黄浦，即洋货拔船，如沙船等各色停泊之所”^②。

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外国银洋也开始流入上海地区。有史料说，“洋钱自嘉庆间仅行闽广，苏松则以贸易故，洋船来不得不用”^③。此外，当时的上海县城及其他一些较大市镇的一些店铺中，已经陈列并且出售各种洋货，甚至连手巾、烟管之类都有舶来货。《淞南乐府》称：“淞南好，新浴晚凉天，日本花巾胸沃雪，暹罗簾管口喷烟，簾阁出天仙。洋花布手巾出日本，非华人所能仿制。暹罗藤烟管，黄质黑章，鳞鳞纤细，难至而易售，价值大昂。”当时地方上已有人不胜感慨，认为上海地方“世俗物用都以自洋来者为贵。无论物产何地，美其名则加一洋字示珍也。更可笑者，贵游奢侈，一切奢丽生色，亦争艳之为洋气云”^④。社会风气的这些初步变化在当时虽然还很微弱，而且其影响面更

①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554页。

② 《清代日记汇抄》第207～208页。

③ 曹晟：《夷患备尝记·事略附记》。

④ 胡式钰《蓑存》卷3“事实”。

为有限,但它却足以说明只要实行对外经济交流,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都必然会受到冲击并发生相应变化。只是在近代之前,这还只是初见端倪而已。

四、洋铜贸易与鸦片走私贸易

清前期上海地区的对外贸易除上述一般的民间贸易外,还有两项特殊的项目,这就是由官府控制的洋铜贸易以及鸦片走私贸易。

中国的采铜及其冶炼有悠久的历史。但自明中叶起由于国内铜产不敷所需,从日本输入的洋铜日益增多。明时输入日铜的主要贸易口岸为福建漳州。《天工开物》称中国用铜“西自四川、贵州为盛,东南间自海舶来……东夷商舶漂入中国,名曰日本铜,漳郡人得之,有以炉再炼”。清代伊始,国内仅官设钱币铸造局即有二十一处,此外还有民间铜器制作,所需原铜除了取给于云南等地铜矿外,相当部分都依赖日本输入。^①乾隆元年清政府准奏:解京铜材以四百万斤为率,买自云南及日本者各二百万斤。

清前期的洋铜贸易由官府统制。贸易商人、商船以及贸易额皆须政府特许、核准,并指定贸易口岸。“康熙六十年(1721年)议言鼓铸铜斤惟需东洋条铜,而洋铜进口船只俱收江、浙二海关,是江、浙为洋铜聚集之区,现在八省分办铜数,俱在江苏、浙江购买。”其中江苏规定为上海口岸,浙江核准为乍浦口岸。至于其他地方,如闽广商船虽然也时往日本贸易,但依照成例,“闽粤洋商向不办铜”^②。

① 日本洋铜输华,除因滇铜不敷应用外,还由于国产滇铜加上运费还不如进口东洋铜便宜。见王太岳《弼政议》,载《皇朝经世文编》卷52。

② 《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皇朝文献通考》卷17,“钱币考”。

清前期上海、乍浦两地的洋铜贸易数额历朝多有变化。康熙、雍正年间,日本产铜甚盛,康熙中后叶,日本每年输出铜材达八百九十万斤之多,内中除少量为荷兰等国商船所购外,大部分都运入中国。以后随铜产量下降,日本政府限船、限量,洋铜输出始减。雍正初,上海、乍浦两地每年前往日本采买洋铜的商船还有三十六艘,每船载铜九万五千斤,年贸易额三百五十万斤。其中收泊上海口岸的约为十八九艘,进口洋铜一百八十万斤。雍正六年以后,虽然船艘未减,但每船载铜已减为七万五千斤,输入总额只有两百七十万斤,其中上海口岸进口额约为一百四十万斤。进口铜额的锐减使贸易商船过剩。至乾隆中叶,江浙两省专事洋铜贸易的商船仅剩十五六艘,额办洋铜也降至二百万斤以下,大体上乍浦、上海各占其半。

从事洋铜贸易的铜商分“官商”、“额商”两种。官商为政府指定,康熙时专以内务府商人充任。他们领有专照,办铜前还可领取铜本银以置办易铜所需的丝、绸等货,但所办之铜须尽数交官。额商系民间商人自报充任,领有专照但无官帑作本,贩运洋铜一般按对半或四六比例按价交官,余则听任按市价自销。是时铜材市价一般总高于官价,故铜商中额商亦较官商为多。嘉庆初,上海口岸贸易铜商中官商仅有一名,年办铜五十万斤。而且由于官府所定铜价过低,官商往往由此赔累,屡屡求退而无人愿意接任。^①迨至近代前夕的道光中叶,由于日铜产量锐减而限制输出,上海口岸的洋铜贸易已降至每年三五十万斤左右。以当时官价每百斤白银十四两五钱计,仅值银四到七万两,即以当时市价每百斤二十五两计算,也只合银七万五千至十二万五千两,其贸易规模已甚为有限。^②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216~217页。

② 上揭书及《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考》;《苏州府志》卷4,卷19。

不过,另一方面,铜商从事洋铜贸易自己并不直接出海,而只是置办齐备易铜商货后委托专营中日贸易的海商进行。这些海商除了承办铜商业务外,自己也随船运去药材、砂糖、土布等国内商货。回棹时除额定洋铜外,又随船载回大量的被称作“倭物”、“诸色”的各种日本商货。^①由于铜船附载商货皆有免税之优惠,而海船载铜数量本来就不多,因此这类附载商货的贸易额往往可以超过洋铜贸易本身。这种在经营官府特许的洋铜贸易的同时又附带经营民间商货的特殊形式,使得当时的洋铜贸易在上海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已超过了单纯的洋铜贸易本身,而成为当时上海口岸外贸的一个重要方面。

鸦片走私贸易是清前期上海地区对外贸易史中最肮脏的一页。鸦片自唐代以来已流入中国,但那时仅作为药物使用。清初康熙、雍正年间,葡萄牙人率先将印度鸦片输入中国。接着英国商人等竞相仿效,并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雍正七(1730)年清政府即下令禁止鸦片输入。自此以后,鸦片贸易以走私形式进行。至十九世纪初,鸦片的年输入量尚为五十万斤,至1836年已高达三百六十四万斤。逐年输入增多的鸦片,麻醉和毒害着中国人民的意志和身躯,同时又造成大量白银外流。

清前期鸦片走私贸易的中心主要在广州外洋的伶仃洋面。西方鸦片贩子将鸦片运抵那里即转售中国商贩。那些商贩除将一部分运入广州售卖外,大部分皆由海路分运沿海各处转销。上海正是当时鸦片销量最大的江南地区的主要转销口岸。据当时清廷官员奏报:“查夷船载运烟土至广东黄埔、老万山二处停泊,内地奸商分设窑口接运,其大宗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专司收囤转贩之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第185~196页。

户。”①其中“江苏所属上海县，为东南数省贩卖鸦片烟口岸，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洋船贩买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②。这些走私鸦片不仅供应上海地区瘾君子的需要，而且还通过各种途径转贩内地各处，其中尤以苏州为最。有记载说，走私鸦片“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③。当时的苏州、上海，鸦片吸食者为数甚多。有人估计道光初仅苏州城内的鸦片吸食者即不下万数，而上海县城据说“每日所进烟土其费倍于米粮”。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时经上海口岸走私而来的鸦片必不在少数。道光十八年十月，江海关官员在县城东门外曾查获数处窝藏烟土，为数甚巨。此外又从苏州、扬州、江宁等府属查获烟土一万六千余两，从走私船中抄获四万多两。④这些偶尔查获的鸦片尽管数量已不少，但它们终究还只是走私贸易中的一个很小部分。有记载说，当时江南各县从上海口岸转销的鸦片“价银，由信货船汇总，有数可稽。大县每日计银五六百两，小县每日计银三四百两不等”⑤。很有可能这一肮脏的走私贸易甚至可以超过前述全部正常的对外贸易总额。

以上我们简要地叙述了清前期上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前的上海虽然并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但是她同外部世界的贸易联系毕竟还是较为有限的。以对外贸易的输出商品而言，主要仅为棉布一项，而且在鸦片战争前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册 3，第 10 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 315。

③ 《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册 4，第 945~946 页。

④⑤ 同注②。

夕也已趋于中落。输入商品虽然有各种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奢侈消费品，但以贸易的规模而言，以走私形式进行的鸦片贸易似乎还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外国列强企图以鸦片贸易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迫切心情。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殖民主义曾多次企图向上海渗透。1832年，东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号船来上海更是想方设法向上海道台衙门请求直接通商，但都没能成功。因此直到近代前夕，上海地区的对外贸易额始终尚在广州、厦门等口岸之下。只是在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上海地区的对外贸易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